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社會實踐獎
2021 年 4 月

八年級生的太陽花覺醒： 探討明星高中與一般高中學生的大學科系選擇

社學四 林芸品

摘要

太陽花運動至今已過七年，足以讓當時的國中生屆臨大學畢業，在八年級生的記憶裡或多或少都有留下影子，而這個運動的身影究竟留下了什麼、改變了什麼，便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因此，我透過「生命歷程研究」的課程與其觀點，佐以個人經驗，嘗試探討同世代人的大學科系選擇。訪談後發現在歷經太陽花運動後，個人傾向所形塑的能動性不太能影響大學科系選擇，太陽花運動的影響更像是附加作用；而明星高中相比一般高中也沒有較高的能動性影響其學生的科系選擇。這樣子的結果與我的想像完全相反，但同時也在訪談中意外發現太陽花運動似乎成為了八年級生的議題啟蒙點，無形中開發了改變社會更大的可能性。

*如需引用，格式如下：林芸品 (2021) 八年級生的太陽花覺醒：探討明星高中與一般高中的大學科系選擇。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實踐獎報告。

一、研究動機

太陽花學運發生於 2014 年，當時我還只是國三生，但報導的每一個畫面，至今仍歷歷在目。而運動三年後我選擇就讀社會學系，身旁也不乏主修人文、社會及行為科學...等相關學系的高中同學。以此讓我不禁思考，太陽花學運作為野百合後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是否對當時面臨生涯抉擇的學生們有所影響？而明星高中與一般高中的學生在同樣經歷過太陽花後，又有什麼選擇上的差異呢？此研究便以此二問題作為出發點，探討能動性在不同群體上的影響。

二、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之動機，本研究欲探討的問題包括：

（一）在歷經太陽花運動後，個人傾向所形塑的主觀能動性是否能影響大學科系選擇？

（二）在歷經太陽花運動後，明星高中相較於一般高中具更高客觀能動性的現象是否影響了其在大學科系選擇？

三、文獻回顧

（一）太陽花運動的脈絡與進程

2014 年 3 月 17 日，由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和黑色島國青年陣線規劃「捍衛民主 120 小時行動」並發表聲明，宣告其對服貿協議認定應逐條、逐項、逐案審查的意志，主張兩岸協商的透明、監督機制，並以此發起反對服務貿易協議黑箱作業的行動。

然而在當天下午，中國國民黨立院黨團副書記長張慶忠在一陣混亂的會議中，強行通關《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加上該黨前個禮拜倉促粗糙地舉行數場公聽會，顯無傾聽民意的意念。隔日，由學生及 NGO 團體便開始計畫反制行動，決議佔領議場，以此揭開運動序幕。

佔領立法院的行動主要分成三個路線。首先是由青島東路的側門攻堅的主路線，由約 50 明的志願軍組成；其他兩路則分別是由公投護台灣聯盟（簡稱公投盟）來聲東擊西的中山南路大門路線，以及當時正在舉辦的「守護民主之夜」活動此一路線。隨後到了晚間 9 點，行動開始。由於支路線分散警力的成效顯著，負責主佔領路線的志願軍很快的進入了議場，而在尚未安頓之際，議場內的成員需要一邊籌備物資、維持

秩序，一邊留意抵禦警方的突破，直至警方多次攻堅失敗，場外公民團體、在野黨幫忙輸入物資，場內狀況便逐漸穩固下來，成員也開始進行分工、選出領導核心（含運動領袖林飛帆、陳為廷），以此逐漸勾勒出長期抗爭的輪廓。

除了衝入立法院的成員，立法院外為了維持運動熱度，也做了不少行動：街頭公民教室、非暴力抗爭演講、反服貿議題課程……另外，為了讓整個運動的組織更加完整，學生代表與公民團體會固定舉辦聯席會議，以連結場內外的合作。而運動成員也在 3 月 20 日借用了台大的教室作為後勤基地，並運用勞工陣線在林森南路的辦公室開會，作為運動的總指揮部。在群眾進入立法院前，運動訴求是服貿理應重新逐條審查。而在佔領立法院的期間，學生則是不斷呼籲官方，包含時任的馬英九總統、江宜樺行政院院長，以及各方執政高層能夠退回《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但始終沒有得到許諾，因此部分成員開始發出希望能擴大行動、提高運動強度的聲音。然而，運動組織內部成員對於這些想法並沒有一致的意見，這些歧意也間接地成為之後佔領行政院運動的引線。

3 月 23 日傍晚 7 點，部分學生（社科院派居多）開始擴大行動規模，鎖定行政院作為佔領標的。時間一到，成員運用先前準備的工具越過行政院的拒馬、突破防線，而因為警方當日在行政院沒有特別部署人力，所以群眾在短時間內就衝入了行政院。在群眾進入行政院之際，行政院立即發表了聲明譴責群眾的暴力行為，並下令加派警力驅離。而衝入行政院的群眾實際上處於一個近似群龍無首的狀態，組成成員不僅只學生，也有許多是 NGO 號召的人民與自主公民。在經過一陣子的混亂後，世新社發所的學生陳廷豪和黑島青總召魏揚見狀便陸續接下了現場總指揮的棒子，但行政院運動當下的狀態已經超出指揮可以控制的範圍。在接近凌晨的時刻，鎮暴警察抵達現場，領導團體無法有效地讓群眾快速離開。時間一到，鎮暴警察開始強行驅離群眾，現場狀況十分混亂，流血衝突不斷。從凌晨 12 時至清晨 6、7 時，警方不斷執行一波又一波的驅離攻勢、逮捕參與者，強硬的將群眾趕離行政院，退回立法院的範圍。

正由於佔領行政院是運動內部較為激進派的主張，因此，行政院行動的失敗可以說是回應了運動組織內部擴大行動的聲音。至此，立法院內的決策地位更加穩固，內部的權力分歧也漸趨消失。在之後數日，對於 323 暴力鎮壓抗議者、「國家暴力」的批評炎上，政府方一改之前強硬的態度，表示願意無條件與學生面對晤談，同時，運動決策者也發起 330 大型遊行。這場遊行雖然看似成功，但之後數天議場外的群眾人

數卻急速下降，運動的持續與否受到嚴重挑戰。因此，運動領導者開始著手思考最全面的退場方式，以利在傷害最小的時機，達到訴求，結束整個運動。

直至4月6日，時任立法院院長的王金平不僅進入議場和學生有所互動，在議場外更是承諾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完成立法前，將不會召開相關服貿協議的黨團協商，似乎是在回應運動「先立法，再審查」的訴求，這樣的表態瞬間讓國民黨內部分裂的問題浮上檯面。當時黨內的副書記長費鴻泰對此表達強烈的背叛感，但當時的台北市長郝龍斌、新北市長朱立倫，以及台中市長胡志強對此則是表達支持的，在這樣的背景下，王院長的發言之於黨內意見是具有部分代表性的，而這樣發表讓運動成員對於退場的決策有更紮實的立足點，並表示將會發表有關乎運動走向的決策。

4月7日晚間，運動者們發表退場演說，承諾在三天後（4月10日）退出議場，對於這樣的決策有人支持、有人反對，但大部分的人依舊遵守退場宣言，在10號先後離開。在退場之際，出現了不少公民行動：太陽花論壇、割蘭尾、人民議會…，試圖在這樣的浪潮下發出更多聲音，共同監督公共決策。而在退場的末段，眾人合力將太陽花傳遞給議場外的所有公民，象徵太陽花的精神將在各處遍地開花，並在最後演唱「島嶼天光」，提醒政治人物記取此次運動的教訓，為運動畫上休止符。

（二）太陽花學運之於台灣的意義

「在全世界的學生運動歷史中，太陽花學運創下了紀錄。……但是至今還沒有一場學生運動能夠長期癱瘓國會運作，造成憲政危機，而且還持續獲得過半的民意支持。」（何明修，2014）

當群體因為權力關係的不對等，導致無法透過適當的政治管道發聲，使其必須指望體制外的手段來促成目的達成，社會運動的形成便指日可待。同時，社會運動的成功與否，其實是受限於一連串政治條件的組合，而這樣結構性的因素，我們可以大概歸納出兩個類別：「政治機會結構」（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與「威脅」（threat）。政治機會結構可以被定義為「協助或阻礙政治行動者集體行動之體制與制度的特徵」（何明修，2016），也就是說，國家政治在當下的組成和情境，可能將形成挑戰者（challenger）選擇運用的機會。而如果說政治機會結構是形成有利於挑戰者訴求的形式、降低了抗爭成本，那麼威脅就是作為一種危機意識提高的條件，將不抗爭的成本提高，促使挑戰者採取行動應對。在這兩種因素的影響下，太陽花運動成為

台灣近十年最大、成果也較顯著的社會運動，但究竟是什麼樣具體的情勢使得太陽花有這樣的發展，以下便將逐項解釋。

1. 政治機會結構

首先，我將當時的政治機會結構組成主要分成兩個部分：「國民黨內部分裂」與「政治聯盟者的出現」。

(1.) 國民黨內部分裂

國民黨內部分裂，主要是由於九月政爭（馬王政爭）的出現。2013年9月，時任立法院院長的王金平涉嫌關說，當時的總統兼國民黨黨主席的馬英九立即公開指責王金平行事不正、有違黨紀，並欲開除其黨籍。而由於王金平屬於黨提名的不分區立委，因此開除黨籍將立即剝奪其立法委員的身分與立法院院長的職位，在這樣的情況下，王金平提出訴訟以保留其黨籍。

台北地院一審對王金平確認黨籍存在訴訟案在2014年3月19日公告審判結果，這個時間點正好與太陽花的運動者衝入立法院的時間點相隔不久，這樣子的時機促成了運動者得以固守議院的結果。據何明修（2016）分析，「……如果官司結果不利於王，他有可能立即喪失立委與院長的資格。從這個角度思考，王金平沒有必要對學生採取強硬的立場，因為這不但會傷害他個人的聲望，也只會幫了他的政敵。」，因此在驅離之際，王金平並沒有增派警力支援。而在公告審判結果保留黨籍之後，立院內外都聚集了一定數量的抗爭者與聲援者，顯示當局已錯失在第一時間驅離的時機，使得運動踏穩了第一步。

另外，在占領初期，總統馬英九與行政院長江宜樺都對運動表現出了強硬的態度，但時任台北市長的郝龍斌與新北市長朱立倫都對運動發表了較為友善的意見，他們對運動較友善的姿態，與馬江的態度明顯不一，國民黨領導高層出現了明顯的裂痕。（何明修，2019）再者，在運動後段，當王金平表示願意先擱置《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先處理《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等呼應運動訴求的意見，郝朱同樣的附和便再度凸顯國民黨內部的意見分歧。在這樣的條件下，是有益於太陽花運動者宣稱其運動成功並取得退場正當性的，因此，我們可以認定執政黨內部的分裂創造了當時運動的契機，形成一種政治機會結構。

（2.）政治聯盟者的出現

另一個政治機會結構則是政治聯盟者的出現，他們所享有的制度內資源與權力能幫助體制外的抗爭者。社會運動無論具有多麼強大的內部組織，仍缺乏制度性的管道，無法參與實際的決策過程，而這是穩固的政黨所具備的。因此，反對黨的聲援，通常能夠提升社會運動的政治影響力。（何明修，2016）而太陽花運動的主要政治聯盟者，就是當時台灣最大的在野黨民進黨。

實際上在 2008 年總統大選慘敗給國民黨後，民進黨就一直在修正黨的路線、擺脫逢中必反的標籤，因此在倉促通過服貿前，民進黨是保持著只要逐項審查就不予以阻卻的態度。但就正是因為「半分忠」事件，使得民進黨失去表態的資格。當其身為政體成員身分受到挑戰，民進黨便選擇了支持太陽花運動，要求撤回服貿。簡而言之，國民黨突如其來的議事攻勢反而為反服貿運動者爭取到政治聯盟者。（何明修，2016）

這樣的轉變使得挑戰者在行動中比起以往獲得更大的優勢，在 3 月 18 日衝入立法院的稍晚，民進黨便出動重量級的黨員坐鎮，以此抵禦部分警察對於運動的攻勢，確保物資的流通與人員安全，另外也曾在日後動員其支持者來表示支持學生。民進黨作為一個強力的政治聯盟者，大大的提升運動的影響力度，也為其爭取部分政治表態的資格，成為另一個當時有利於太陽花運動的政治機會結構。

2. 威脅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實際上是《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又稱 ECFA）眾多協定中的一環，而在簽訂 ECFA 時普遍民眾是採取較正面的態度的，但是由於國民黨政府對協商服貿的過程倉促又缺乏代表性，關於服貿的內容更是在簽訂的幾天前才被公開，種種的因素都讓民眾開始對於此協議有所質疑。再加上國內民眾對與中國的經濟關係所帶來的政治後果有高度的顧慮，有百分之五十四點五的受訪者認為當台灣與中國的經濟關係越來越密切，將可能導致贊成和中國統一的民眾增加（傅仰止，2014）在這樣的氛圍下，台灣人民似乎表達出比起以往更負面的態度在看待服貿。

另外，國民黨委員在議院強行通關服貿的作為也成為提高運動威脅的一環。因為原本就有相當多人對於更緊密的兩岸經貿關係感到疑慮，但卻一直沒有參與抗爭行動。國民黨立委充滿爭議的議事操作，正好落實了服貿是巨大黑箱的指控。（何明修，2016）為了通過與中國的貿易協定，不惜犧牲台灣的民主程序，這樣輕易打破民主規範的行為，彷彿是暗示在執政黨的觀念中，經濟考量是優於民主價值的。至此，當群

眾意識到，如果不發聲將會面臨失去主權的風險相較於參與運動的風險是更高的，那麼群眾就會更加願意與挑戰者站在一起。在對於社會運動容忍度較低的台灣社會來說，此現象不僅為運動者打上強心針，更為其發聲帶來了一定的代表性，使得太陽花運動成為一個具民意基礎與重大意義的近代台灣社會運動。

（三、）個人能動性

人的出生象徵了生命進入社會情境與歷史脈絡的起點，這些社會情境與歷史脈絡都會在有形無形中形塑個體的生命歷程。

根據 John Meyer 跟 Ronald Jepperson 認為能動性（agency）是為一種現代文化的騙局。隨著時代演進，人們不再堅信上帝就是自己命運的主宰者，而是轉而認為自己才能決定自己的生命。然而隨著現代國家體制的建立，國家制度對個人的控制比起以往的社會更加強烈，人們誤以為自己是生命的主宰，但實則不然。而根據 Mustapha Emirbayer 和 Ann Mische 的研究指出，能動性其實包含三個概念：互動性（iteration），人們利用篩選過去的經驗來為現下做出行動；實際評估（practical evaluation）個體對於被給予的情境所需求的行動進行判斷的能力；投射力（projectivity）利用想像創生一個可能的未來的行動。以下將予以解釋這三個概念：

1. 互動性（Iteration）

互動性有兩個核心概念，Schema 跟 Autobiographical memory。Schema 即是在說個人過去的經驗成為現下的劇本，包含了許多不同種類的經驗，當我們要決定現在要做什麼的時候，我們會藉由這些種類進行挑選。舉例來說，Schema 可能討論範圍在於一個人對家庭的想像、對於退休的想像……等等。而 Autobiographical memory 則是立基於社會情境及特定重要事件的記憶經驗。

2. 實際評估（Practical evaluation）

實際評估是在討論說，當人們遇到情境時，個人做出選擇的特殊性。而實際評估大概涉及了兩個概念：主觀認知年齡（subjective age identity）以及自我效能（self-efficacy）。主觀認知年齡是在表達個體感受年齡角色的認知，並依此表現出符合自己想像內的樣貌，而自我效能則是個人對於完成任務或達成目標的信念程度。當這些自

我覺察下的年齡任務被完成時，自我效能感是會更加穩固的，反之，當這些任務未被完成或滿足，自我效能感是會被削弱的，因此形成效能或無效能的循環。

3. 投射力 (Projectivity)

投射力是在討論人們對於未來的想像，其中一個關鍵的概念就是期望自我 (possible selves)，即人們對於自己所預期、希望之未來的想像。不過個人對於實現期望自我的成功與否是取決於社會情境的，可能關乎教育程度、家庭社經地位……等。

總結來說，人們對於個人能動性的掌握度其實是有限的，更多的是社會的結構引導了你的決定。即便是依據過去經驗的所做出的抉擇，這些關於經驗的記憶也可能是被挑選過的，而關於未來，對於期望自我的比較也通常是根據特定社會角色的期待。現下的每一步更正是過去經驗與未來展望的結合，因此，作為重要社會事件的太陽花運動，可能也是過去經驗的一環，成為影響個人能動性的因素之一。

(四、) 科系選擇與公共議題

大學教育相較於高中教育，除了立學上有更大的自由度、能夠按照科系專科學系之外，大學教育也對學生們各項態度、價值以及未來的職涯發展與經濟狀況有著具關鍵性的長久影響。(Pascarella and Terenzini, 1991; Feldman and Newcomb, 1994; Jennings and Stoker, 2008) 大學教育的選擇作為一個個體在當時來講重要的轉銜 (transition)，是關乎價值觀的選擇的，那在(陳婉琪、黃樹仁, 2015)的文獻中提到藝術、人文、社會及行為科學、傳播、法律等學門在樣本出現的比例顯著高於在學人口比例。從中我們可以提出兩個方向的推論，第一個是個體對於價值觀的傾向，影響了其在大學科系的選擇，進而組成了當年度太陽花運動的人口圖像；第二個方向的推論則是說，個人在選擇的科系中的學習影響了其價值觀，進而組成了當年度的太陽花運動人口圖像。在這裡我以前者「個人傾向」來討論大學科系的選擇。

根據陳光輝(2018)在報紙、網路新聞與政論節目這三個項目上都有顯示使用該媒介與獲取政治資訊的關聯性，而相較於一般高中學生，明星高中學生各類讀物的閱讀頻率較高(黃雅容, 2009)，在這之中就顯示明星高中學生會比一般高中的學生獲取更多的政治資訊。另外，在陳光輝(2018)中我們看到政治系新生在入學前在使用報紙、網路新聞與政論節目都比起其他學生具顯著較高的使用頻率。因此，從政治系的經驗上我們可以發現，取用更多的政治資訊，對於學生選擇就讀政治系是有正相關

的。那麼其他同樣屬於太陽花運動人口圖像中高於在學人口比例的學門，或許將可以作為政治系現象的延伸，在取得更多的太陽花運動資訊後，因而比起一般高中的學生更傾向選擇這些學門。

因此作為研究假設的一環，在經歷太陽花事件的人口中，我們或許可以推論受訪學生在對於民主制度的正向評價、台灣人認同已對政治事務的關注都與參與太陽花學運有顯著的正向相關性。

四、研究方法

為了了解太陽花運動作為重要的歷史事件是否對於該世代的人產生大學科系的選擇影響，以及探討明星高中與一般高中學生對於歷經太陽花運動後的大學科系選擇差異，除了查找相關運動資訊與能動性的資料。我將採質性訪談的方式，將受訪者分為一般高中與明星高中兩個分類，同時控制性別、類組及地區，藉此更深入了解選擇的原因及個人能動性的展現。

在經過資料彙整與質性分析後，我將觀察研究結果是否回應了研究問題，並針對一些現象提出太陽花運動相關的看法與見解。

（一、）訪談綱架設計

此次研究訪談採半結構式訪談法，無論是一般高中還是明星高中的受訪者皆採用同一訪綱，訪綱內容分為個人資料、背景資訊與個人想法三大類別。透過上述的訪綱設計從受訪者提供的資訊和我個人的統整與歸納分析來回應研究問題。訪綱與受訪者資訊整理請建祥建文末附錄。

（二、）抽樣方法與依據

抽樣方法方面，我採用立意抽樣與滾雪球抽樣方法，按照研究主旨來尋找受訪者，並同時透過部分受訪者的引介尋找其他受訪對象。而根據（黃雅容，2009）依照傳統聲譽所界定的明星高中標準，找出男女各 4 位畢業於明星高中，現已就讀大學的受訪者，以及男女各 4 位畢業於一般高中，現已就讀大學的受訪者，同時控制其高中就讀類組，進行訪談。

（三、）實際操作流程

我將訪談時間大約設定在 20 至 40 分鐘內，採一對一的方式訪談，利用已擬好的訪綱進行，並在最後提供補充資訊，讓受訪者得以更深入的討論過程中有趣或需要再說明的部分。另外，在訪談同時也有錄音檔紀錄以便日後整理逐字稿與資料統整所需。

五、研究發現

（一、）太陽花運動與科系選擇

首先從「在考大學得當時，自己選擇科系的依據是？」這題中發現，所有的受訪者都是以興趣與工作願景作為選擇導向，並有少數的人受訪者表示高中的性向測驗也成為他們選擇科系的依據。而在問到太陽花對當時選擇大學科系的影響時，在十六位受訪者中只有三位表示有影響，但影響力不大。

受訪者 J 表示：

有，但我不會覺得他是一個很大的原因，而是在旁邊小小的某一塊。重要的大部分的原因還是未來願景……而且對社會系、政治系這些我好像也沒那麼有把握做得來，有點像是考慮我的能力後，加上做完那些有興趣的議題的功課，所以在最後選擇了社工系。

受訪者 I 表示：

因為可能我剛好科系選擇上就跟這些事情有點相關，它可能算有增強一點點我的意願，就會想知道黑箱那些比較運動前期的事情，對我的科系選擇可能有一點點比較正面的影響，就想要釐清事情的脈絡的感覺。

從訪談內容可以得知，雖然太陽花運動對他們大學科系選擇有所影響，但更像是在先前就確立自己方向之後，加深其就讀意念的一個環節。特別要看到的是，這三位認為運動對自己科系選擇有所影響的同學，所就讀的科系都屬於陳婉琪、黃樹仁（2015）提到的樣本出現的比例顯著高於在學人口比例的科系類群。

而在其他十三位認為沒有影響的受訪者中有提到他們認為社會運動或公共議題與自己科系選擇是兩件不同性質的事，還是會以自己的依據決定。

受訪者 C 表示：

本來就是要走三類，因為我就覺得那個跟我無關吧，那個生活圈、要搞社運的人跟我無關，那時候是這樣覺得啦。我不是讀相關科系的，我對那個也沒有興趣，那這東西跟我沒有關係這樣子。

受訪者 F 表示：

其實那時候沒有甚麼影響耶，因為基本上我也不是想走什麼社會學系之類的，所以太陽花學運對我的科系選擇本來就沒那麼重要。再加上我覺得興趣也不一樣，所以幾乎等於沒有影響，科系選擇在當時就是以興趣跟分數為主。

從訪談紀錄看下來，認為沒有影響的受訪者大都覺得運動跟自己無關，而以自己的考量為重。而這十三位受訪者中有八位是屬於陳婉琪、黃樹仁（2015）提到的樣本出現比例顯著低於在學人口比例的學群，像是商管、工程與電算機…等類別。

總結來說，無論在有影響或沒影響的人口中，運動比起直接影響科系選擇的意願，更趨向是一個附加的效應。假設學生的選擇依據推使他剛好要走到人文、社會及行為科學、法律…等學門，那太陽花運動就比較可能增強他讀這些科系的意願；反之，當學生的選擇依據沒有傾向這類型的學門，那麼太陽花運動可能不會對其有所影響。因此，在選擇大學科系的個人能動性上，太陽花運動作為一個重大的社會事件的影響是有限的，自我期望的牽動性可能在這件事情上有更大的發揮。

（二、）明星高中與一般高中的科系選擇差異

如研究方法所述，本研究抽樣了男女各八位曾就讀明星高中與一般高中學生。從訪談內容可以得知在學生自治團體的方面，一般高中的學生會似乎略比明星高中的學生會（各校名字不同）更著重在舉辦康樂性質的活動，而對學生權利、公共議題方面在觀感上稍顯不足。但是在有影響的三位受訪者中，有兩位是來自一般高中的學生。

其中受訪者 I 表示：

我的同學們好像沒有非常的關注這件事……我記得我們公民老師特別用了一堂公民課來跟我們講這件事情的發生……最後讓我們發問關於這件事的問題。我記得大家是滿認真在聽，但最後有問問題的人不是很多……。

而同樣來自一般高中的受訪者 J 也同樣表示當時沒什麼同學在關注太陽花運動，但是來自明星高中的受訪者 E 表示：

我們學校的學生整體來講都算支持……我們公民老師、教官都算支持，會告訴我們要去可以但就是注意安全。同學的話就是在講他們（國民黨）的手段吧，怎麼會 30 秒去通過一個東西，多數暴力跟程序正義，324 就是在講國家暴力，警察濫用權力，違反比例原則。

由他們敘述可以了解，明星高中的學生比起一般高中的學生對於太陽花事件可能有更多想法，而使得一般高中的學生在面對像太陽花運動這樣的公共議題時，更仰賴校外的資源去理解，例如受訪者 J 表示：

高二寒假那時候我有想要參加一個科技部辦的高中生人文社會營隊……後來辦了一個寒假的聚會，裡面的人對於這些事情是非常了解的，我覺得這個營隊對我的影響滿重要的。不只是他們對太陽花運動的想法，包括他們對這個社會的想法都讓我看到從未見過的世界的感覺。

總的來說，無論是明星高中還是一般高中，八年級生對於太陽花運動的態度是中間偏正面的，原因包括受訪者 L 說到「滿佩服這些意見領袖勇於去發表年輕世代的聲音」以及受訪者 N 提到「我覺得可以適時的跟政府爭取一些東西」這些。而在受到影響的受訪者中，雖然一般高中更需要校外資源來幫助理解，但是這樣的取得途徑似乎比起明星高中的學生在科系選擇上建立了更穩固的影響程度。

（三、）太陽花運動的觀感、影響與其他

在回答問題「你覺得太陽花運動帶給你什麼影響？」中，研究發現有超過半數的受訪者對於經歷過太陽花運動，認知到群眾的力量是非常有影響力的。

受訪者 M 提到：

會覺得其實學生的力量是滿大的。可能大人都會覺得說我們這個階段就應該要好好讀書，但是從太陽花開始，到最近有香港，香港也幾乎都是年輕的學生開啟運動……我覺得這個其實是好事，這樣代表我們年輕人會越想越多，會去思考這件事情是對的還是錯的。覺得學生好像學生越來越會為這個社會著想，會再去想一下這件事情、更關心時事。

受訪者 E 提到：

對公共事務的關心程度會比以前更深入一點，不會說單看表面……而且會覺得我們好像真的有能力可以去做到以前沒有想到可以做到的事情，如果力量夠大的話，好像可以多少改變這個社會，做起事情來會比較有信心吧。

另外，除了對於群眾的力量賦予肯定外，也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太陽花運動是他們對於公共議題的啟蒙點，例如受訪者 A 提到：

比如說後來的那些抗議行動，會比較願意去現場支援，會覺得說像這樣我們覺得不對的事情要站出來。像是之前反紅媒、同志大遊行，或像是連署書雖然在車站（填寫地點）還是會願意特地去簽。

受訪者 B 則提到：

之後的運動都會稍微看一下吧，像之前香港也有關心。可能小時候就會覺得不甘我的事，可是之後就會覺得甘我的事，所以就會去關心。

由此可以知道，雖然太陽花運動可能對其沒有影響到大學科系的選擇，但是在於關注議題方面卻有一定的影響力，讓這一代的人對於公共議題的認知更往前一點。

六、結論

對於研究問題一「在歷經太陽花運動後，個人傾向所形塑的能動性是否能影響大學科系選擇？」的答案是否定的，太陽花運動的影響比起直接更像是附加作用。在對有影響的人來說，他們原本對於自己的方向已有一定的肯定，所以太陽花運動的發生是加深了他們對於此類科系的認定程度，而非從其他方向轉移；對沒有影響的人來說，除了原先就興趣缺缺外，他們會把自己跟這樣的公共事件切割，認為公共事務的發生可能是重要的，但自己的方向應該要與這些所謂的「外界干擾」分開。

對於研究問題二「在歷經太陽花運動後，明星高中相較於一般高中具更高能動性的現象是否影響科系選擇？」的答案也是否定。從有影響的三位受訪者來看，雖然一位來自明星高中的受訪者比起其他兩位來自一般高中的受訪者表示有更多的同儕關心太陽花運動，但透過外界資源的鏈結，像是大學營隊這樣來自跟以往校園不同的學習環境的影響可能更甚。

除此二研究問題外，仍有發現像是「認可群眾力量」、「開始關心公共議題」、「運動成員從政觀感不佳」……等等耐人深省的回覆，待我們更深入探究太陽花運動，

各類型的社會運動、公共議題。同時，在這篇研究裡也有推論人口圖像的歸因、訪綱問題過於偏向量化研究、東部樣本不足…等研究限制，是在日後可以再修正的部分。總結而言，太陽花運動在大學科系選擇的影響雖然似乎遠低於我的想像，但卻對於這個世代喚起了更多思想上的多元性，使其在輸入資訊與輸出討論間想到更多問題，作為公民運動的啟蒙點，太陽花運動仍是重要的標竿。最後，期許所有人都能以更多面向的角度來看待這件重要的歷史事件，而非將其定義為單一呆板的圖像。

附錄 1 訪綱

個人資料

1. 請問你現在的學校、系級與年齡？
2. 可以請你簡單的介紹一下你的科系嗎？
3. 在考大學的當時，自己選擇科系的依據是？
4. 在考大學的當時，自己對理想科系的想像是什麼？
5. 在考大學的時候，你覺得自己對科系選擇的掌握度高嗎？

背景資訊

1. 太陽花運動發生時（2014/03/18），請問你的年齡、年級？
2. 你可以描述一下你認識的太陽花運動嗎？
3. 太陽花運動發生時，周遭的人是什麼看法呢？
4. 太陽花運動發生後，周遭的人是什麼看法呢？
5. 太陽花運動發生時，自己是如何取得資訊的呢？
6. 太陽花運動發生時，自己是什麼看法呢？個人又是持以什麼態度呢？
7. 太陽花運動發生過後，自己是什麼看法呢？個人又是持以甚麼態度呢？

個人想法

- 1-1. 在問到態度的時候，我發現你對太陽花運動的態度有所轉變
想請問這樣的狀況是為什麼呢？
- 1-2. 在問到態度的時候，我發現你對太陽花運動的態度維持一致
想請問在這之中有沒有讓你曾經掙扎的地方，為什麼？
- 1-3 在問到態度的時候，我發現你對太陽花運動沒有想法，是為什麼呢？
剛剛你說到周遭的人有看法，那你覺得他們說的怎麼樣？
2. 你覺得這樣的態度讓太陽花運動對你的科系選擇有產生影響嗎？為什麼？
3. 你覺得太陽花運動帶給你什麼影響？

附錄 2 訪談對象

明星高中 生理女	明星高中 生理男	一般高中 生理女	一般高中 生理男
訪談者 A 畢業於武陵高中	訪談者 E 畢業於建國中學	訪談者 I 畢業於竹北高中	訪談者 M 畢業於馬公高中
訪談者 B 畢業於台中女中	訪談者 F 畢業於台南一中	訪談者 J 畢業於鳳新高中	訪談者 N 畢業於新店高中
訪談者 C 畢業於高雄女中	訪談者 G 畢業於高雄中學	訪談者 K 畢業於復旦高中	訪談者 O 畢業於惠文高中
訪談者 D 畢業於中山女高	訪談者 H 畢業於高雄中學	訪談者 L 畢業於曉明女中	訪談者 P 畢業於竹北高中

參考資料

- 何明修，2019，《為什麼要佔領街頭？》。新北市：左岸文化/遠足文化。
- 何明修，2016，《照破 太陽花運動的振福、縱身與視域-政治機會、威脅與太陽花運動》。新北市：左岸文化。
- 何明修，2005，《社會運動概論》。台北市：三民書局。
- 晏山農、羅慧雯、梁秋虹、江昺崙，2015，《這不是太陽花學運：318 運動全紀錄》。台北市：允晨文化。
- 陳婉琪、黃樹仁，2015，〈立法院外的春吶：太陽花運動靜坐者之人口及參與圖像〉。《台灣社會學》30期（2015/12/01），頁141-179。
- 陳光輝，2018，〈政治學相關科系大學生參與太陽花學運的追蹤分析〉。《臺灣民主季刊》15卷2期（2018/06/01），頁51-99。
- 黃雅容，2009，〈從上課方式、補習與課外閱讀比較就讀明星高中與一般高中的學習經驗〉。《教育實踐與研究》22卷1期（2009/06/01），頁113-137。
- Feldman, Kenneth A. and Theodore M. Newcomb (1994). *The Impact of College on Students*. New Jersey :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Jennings, M. Kent and Lura Stoker (2008) "Another and Longer Look at the Impact of Higher Education on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Involve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April 3-6.
- Pascarella, Ernest T. and Patrick T. Terenzini (1991). *How College Affects Students : Findings and Insights from Twenty Years of Research*. San Francisco : Jossey-Bass Publishers.
- Shanahan, M. J. and Ross Macmillan, 2008, P181-234 *B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Contexts and Contingencies*. New York: Norton.



圖：維基百科